

《陳隆志的回憶、見證與實踐》 新書發表會—向陳教授致敬

●蘇芳誼／記錄整理

編按：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於2025年12月20日舉行《陳隆志的回憶、見證與實踐》新書發表會。本文整理自當天「向陳教授致敬」座談會紀錄，與談人包括台灣大學李鴻禧名譽教授、葉俊榮講座教授、詩人李敏勇先生、國史館陳儀深館長，以及鏡電視蔡滄波總經理。

主持人：廖福特／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廖福特董事長致歡迎詞時首先表示，賴清德總統原已安排於12月20日上午親自出席基金會舉辦的新書發表會，向陳隆志教授表達最高敬意；不過，因前一晚台北市發生不幸的暴力攻擊事件，總統隔日清晨必須主持重要國安會議，因而取消原訂到場致詞的行程。賴總統雖然無法親臨現場致詞，但是總統辦公室仍致上賀電，表達祝賀之意。

隨後，廖董事長代表陳隆志教授與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全體董事，誠摯歡迎各界貴賓蒞臨參與《陳隆志的回憶、見證與實踐——台灣國家的進化與正常化》新書發表會。他強調本書得以如期完成，仰賴許多人士的協力支持。首先，要特別感謝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吳樹民董事長及其同仁，協助進行回憶錄資料的初步整理；同時，也感謝允晨文化廖志峰發行人全力支持，配合陳教授的寫作步調，在極短時間內完成排版與編輯工作，使本書得以順利如期出版。

廖董事長也對許多位撰寫序文推薦的前輩與友人表達由衷感謝，包括W. Michael Reisman教授、國史館陳儀深館長、吳樹民資政、王景弘先生、許世楷大使、葉俊榮教授、李敏勇先生及蔡滄波總經理等人。至於後記部分，亦納入基金會董事們、鄭英兒牧師與謝佩芬副秘書長等人的推薦文字，為本書增添深度與可讀性。

廖董事長強調，這本回憶錄不僅記錄陳隆志教授九十年的生長與為理念奮鬥的軌跡，也清楚展現他一生所堅持的核心價值。書中特別表示本書是獻給所有追求「人性尊嚴」與「人類安全」最高價值、致力開創「台灣國家進化論」與推動國家正常化的民主、自由與人權鬥士，藉此向他們表達崇高敬意與由衷感謝。這不只是陳教授個人生命歷程的見證，也是在時代格局之中，努力開展更寬廣視野的重要實踐。

他進一步指出，台灣朝向國家正常化邁進，並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是許多國人共同的期待。因此，今日的新書發表會除了向陳隆志教授致敬之外，也將聚焦於當前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重要議題，包括國際人權理念與世界秩序、台灣的國家主權地位，以及國際參與等面向。廖董事長期盼，透過國人持續不斷的努力與打拚，台灣能夠穩健前行；並以「天佑台灣」彼此勉勵，深信台灣的未來必將更加光明。

最後，廖董事長指出，陳隆志教授於1935年出生，至2025年底，恰逢九十華誕。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特別把握這個難得時刻，向陳教授獻上誠摯祝福，祝他生日快樂、身體健康，並期盼他未來繼續從學術研究與理論實踐的面向切入，帶領大家為提升台灣國家的主權、鞏固民主自由、守護基本人權持續打拚。

與談人：李鴻禧／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李鴻禧教授致詞時表示，受邀出席《陳隆志的回憶、見證與實踐——台灣國家的進化與正常化》新書發表會，並在會中發言，令他深感榮幸。台灣雖然土地面積不大、天然資源相對有限，但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長期以來不僅面對來自中國的併吞威脅，也承受過蔣氏父子專制獨裁體制的壓迫。然而，台灣人民憑藉堅韌不拔的意志與開拓進取的精神，不惜付出流血、流汗甚至生命的代價，持續辛勤耕耘，最終創造出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更重要的是，台灣社會也長期努力之下，逐步落實人民自決原則，推動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政治改革，建立以民主自由與保障基本人權為核心的政治體制。這段台灣民主政治改革的歷程，固然是全體台灣人民共同奮鬥的成果，但其中也凸顯陳隆志教授多年來堅守理念、以學術與行動追求台灣獨立與建國的重要貢獻；今日大家齊聚一堂，正是對這份堅持與這段共同歷史的見證。

李教授表示，陳隆志教授是大他一屆的學長，兩個人現在都已年近九十歲，逐漸走到「老兵不死，只是逐漸凋零」的階段。然而，七十五年前，也就是1950年代的台大校園，陳隆志的大名已是聲名遠播的風雲人物。李教授接著提到，自己大一時通過普通考試，當時就讀大二的陳教授因為大一通過普通考試，取得報考高等考試的資格，最後得到狀元的成績。隔年，李教授通過高等考試，陳教授挑戰司法官考試又名列榜首。之後，李教授大三時通過檢察官考試，而陳教授報考外交官考試也順利及第。由於陳教授參加公務人員考試屢屢奪魁，李教授替他取了「陳狀元」這個外號。

陳隆志教授大學畢業後，前往美國耶魯法學院深造，在美國社會科學泰斗Harold D. Lasswell教授門下學習，接受嚴謹深厚的學術訓練。對此，李教授特別指出，台大校園內會讀書、學問好的人才，比比皆是，但是真正願意承擔艱鉅使命，將所學用於多數不敢碰觸政治禁忌的人少之又少。陳教授假使不投身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純粹從事學術研究的工作，以他卓越的條件與能力，可以在美國，甚至全世界國際法學界，得到很好的地位與聲望。陳教授選擇將自己的才華與學識，義無反顧投入對台灣前途與人民利益的追

求，1967年他與耶魯法學院恩師Harold D. Lasswell教授合作出版*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Formosa in the World Community*，以學術研究的方式向國際社會傳達台灣人民的心聲。也因為如此，他得罪蔣介石父子政權，導致他長達三十三年無法回到台灣。隨後，陳教授回台創立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持續為台灣前途發展盡心盡力，其影響力如光遍照全台各地。

李教授最後總結指出，陳隆志個人生命的回憶錄不走美化包裝的路線，而是以樸實真誠的文字，除了記錄他對台灣國際法律地位問題的研究歷程，同時，親身也見證台灣民主發展的時代脈絡，並寄託他對台灣國家正常化未來前途的深切關懷，凸顯這是一本值得大家細讀珍藏的好書。

葉俊榮／台灣大學講座教授

葉俊榮教授在致詞時，肯定《陳隆志的回憶、見證與實踐——台灣國家的進化與正常化》一書的出版，認為本書發表是再度展現陳隆志教授對台灣深厚真誠的情感。葉教授強調，讀者不僅可以從書中認識台灣很多重要的歷史脈絡，瞭解作者一貫的核心思考，也能進一步看見台灣未來仍須共同努力、持續精進的地方。葉教授利用參加新書發表會的機會，向陳教授表達恭喜之意，並誠摯祝賀陳教授九十華誕「生日快樂」。

葉教授接著表示，剛剛聽到李鴻禧教授對陳隆志教授的高度評價，自己感受尤其深刻。在台灣大學與耶魯大學求學期間，他都分別受到兩位對台灣有高度貢獻的法學前輩的啟發與照顧，讓他深感榮幸。談及自己與陳教授最初的接觸，當年陳教授親自到研究室找他，除了親切問候，也贈送他數本書，其中一本著作便是《台灣的獨立與建國》。日後兩人有深入接觸與互動交流後，他體會到陳教授深厚的學術底蘊。陳教授追隨當代國際法巨擘Myres S. McDougal教授從事研究，學術訓練極為紮實；若他選擇學術研究的道路，可以預期到的是，他會是一位享譽國際的法學家。然而，陳教授並未將才華與心力投注於個人學術名聲的追求，而是把他所有學術研究創新論述的能力，與台灣獨立與建國的運動連結。

葉教授提到，當年在耶魯法學院，學生之間普遍都知道陳教授是一位「國家建構」（Nation Building）的行動者。他將人生中最珍貴的時間，投入自己認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確立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1967年陳教授與恩師Harold D. Lasswell教授合作出版*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Formosa in the World Community*，以完整的國際法理架構與論述探討台灣問題，促使國際社會認識台灣人民的立場與心聲。隨後，陳教授再以這套理論架構獲得同門師兄弟W. Michael Reisman教授的認同，他們兩人合作於1972年在*The Yale Law Journal* 聯名發表“Who Owns Taiwan: A Search for International Title”專文，從國際法角度探討台灣的法律地位。相較之下，陳隆志教授後期完成兩本更具學術經典地位的重要著作，包括1980年與Harold D. Lasswell、Myres S. McDougal兩位大師合作出版的*Human Rights and World Public Order: The Basic Policies of an International*

Law of Human Dignity，以及1989年出版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A Policy-Oriented Perspective*。葉教授藉此說明，陳教授學術成就斐然，而台灣始終是他所有關懷與實踐的核心。

葉教授談起，過往在耶魯大學求學期間，受到陳隆志教授的照顧。兩人經常相約在學校附近的日本料理店用餐，彼此交換對台灣未來發展的看法。當時陳教授因得罪於當道被列入海外黑名單，長達三十三年無法返台，嚴格而言，算是一位政治受害者。然而，他並不因為遭受不公平的對待而自怨自艾，反而持續投入學術研究，專注思考台灣國家地位問題，並為台灣的未來擘劃發展方向。這種不計個人得失、始終為台灣前途著想的精神，讓他由衷敬佩。葉教授也提到，1993年5月27日，他見證陳教授與夫人返抵台灣，跪地親吻土地的那一刻，讓接機的眾人深受感動。他們夫婦對母親台灣深厚的情感，成為日後回台創立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的重要動力。

葉教授進一步指出，陳教授邀集認同台灣的學者專家參與，將多年累積的學術研究心得與理念，藉由演講、出書與舉辦座談會等具體行動，轉化為社會可以理解、可以討論的公共知識，並廣泛傳播於社會之中。這樣的努力，讓更多人得以清楚認識，台灣若要真正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究竟需要具備哪些條件？人民又應如何參與其中、付諸行動，才能一步一步朝此目標邁進。葉教授並補充，自己曾經擔任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的董事，之後又有台大法律學院張文貞教授接棒加入，並與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廖福特研究員、台北大學法律系官曉薇教授、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蘇彥圖研究員，以及輔仁大學學士後法律學系姚孟昌教授等新一代學者專家，共同投入基金會工作，持續為台灣及基金會的長遠發展持續努力。

葉教授總結指出，陳教授這部回憶錄闡述的重點，並不在於彰顯個人的成就，而是在於依循其一貫的思考方式，忠實保留事件原貌，將九十年來所經歷的人、事、時、地、物及其歷史脈絡，如實且完整地記錄下來。在當前國內外局勢快速變動的時代環境中，作者仍能始終堅持理念，貫徹其核心價值，這正是他最敬佩陳教授的地方。

最後，葉教授感謝陳教授毫無保留分享其生命經驗，相信所有讀者都能從書中獲得深刻啟發。同時，他也祝福陳教授持續保持愉快心情與健康身體。對於台灣社會未來的發展，葉教授抱持樂觀的態度，相信隨著越來越多年輕學者與專家勇敢接棒，投入重要公共議題的認知、推動與實踐，台灣的未來是值得期待的，也請陳教授放心。

李敏勇／詩人

李敏勇老師致詞時首先提到，1993年陳隆志教授回到台灣，當時他正好擔任台灣筆會會長。在會長兩年任期內，台灣筆會共舉辦二十四場系列演講，他邀請台灣社會二十四位重要人士，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不同領域發表演說，陳教授也是其中之一。這一系列演講內容後來集結出版為《台灣的二十四節課》一書，系統性探討台灣國家重建的二十四項關鍵課題，由此開啟他與陳教授兩人長年交流的序幕。

李老師回憶當年情景時，感嘆時光飛逝。當時陳教授年紀尚未滿六十歲，自己也不到五十歲。1980年代末期，台灣出現政治改革的浪潮，嚴重衝擊當時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促使台灣走出威權體制，朝向民主化、本土化的改革方向前進。令人感慨的是，台灣歷經多年改革與發展，陳隆志教授主張「台灣國家正常化」的核心課題，至今仍未真正獲得解決。由此可見台灣所面臨的歷史與現實困境，也凸顯陳教授所提出的建言與思考方向，至今依然具有重要且深刻的意義。

接著，李老師以長年關注台灣歷史與國家發展的視角出發，談及他閱讀陳隆志教授這本回憶錄後的感受，以及對台灣當前處境的思考。他指出，台灣問題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所遺留下來特殊的歷史問題。回顧台灣歷史的發展脈絡，清廷在清日戰爭中失敗，台灣被割讓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由於台灣人普遍對祖國存在著迷惘，台灣沒有像其他被殖民的國家一樣，轉變成一個新興主權獨立的國家，反倒因為中華民國流亡政權來台，被迫捲入國共內戰的漩渦之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形成雙邊對抗的態勢，這個歷史的糾結至今仍未鬆綁。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也出現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二次大戰後共產化的國家與後來脫離共產化國家的問題。東歐國家在二次大戰期間，很多是納粹德國的佔領區，在當地與納粹德國周旋的成員大多數是共產黨員，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些東歐國家自然選擇附和蘇聯的路線，參加華沙公約組織。顯然，當時多數東歐國家並非在共產黨武力脅迫下淪為共黨政權，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人民選擇那樣的道路。戰後東歐國家政治體制的形成過程，與台灣的情況並不相同。

李敏勇老師特別指出，自己曾出版不少探討台灣戒嚴體制與政治壓迫的作品，而在其思想形成過程中，東歐共產體制國家流亡作家的經驗帶給他深刻影響。這些針對蘇聯主導下的共產極權體制展開文化抗爭的作家多半流亡美國，並與當時同樣旅居海外對抗中國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台灣有不少交流接觸，彼此在對抗政治壓迫、流亡經驗與追求自由的際遇有許多相同之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者乃是198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詩人米沃斯（Czesław Miłosz）。米沃斯原曾擔任波蘭駐法國大使館的文化參事，後來離開共產政權體制，轉赴美國任教，講授斯拉夫文學。此後，他又與另一位自蘇聯流亡美國的詩人布羅斯基（Joseph Brodsky）相識。李老師認為，這兩位詩人可視為「東歐極權體制、流亡經驗與美國思想環境」下的代表人物。其中，布羅斯基提出「詩人要介入政治，一直到政治不再干涉詩人為止」的觀點，深深影響李老師。他認為，這不只是文學立場的表達，更點出了文化工作者無法對政治壓迫保持沉默的根本原因。

李敏勇老師進一步比較台灣與東歐國家的政治發展，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1987年台灣好不容易解除戒嚴，東歐各國幾乎也在同一時期，陸續掀起民主化浪潮。時序進入1990年代後，波蘭與捷克等中東歐國家，相繼推動政治自由化的體制轉型，並透過民主選舉與制度改革，終結原有的共產黨統治。這一波變革改變東歐國家的政治面

貌，也進一步牽動蘇聯共產體制的鬆動與解體。

在此基礎上，李老師提出一項根本性的問題：台灣與東歐國家同樣經歷戰後巨變與威權統治，為何到最後出現不同的發展路徑？他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由日本殖民地轉變成為中華民國體制之下，一個類似的被殖民地，隨後台灣被捲入國共內戰的歷史漩渦之中，直到今日仍未真正脫身。顯然，台灣的問題不只是民主化是否完成的問題，更牽涉到國家定位、主權形式與歷史名份始終未能徹底釐清等種種問題。另外，還有一個弔詭的問題就是，台灣解除戒嚴之後，已逐步完成民主轉型，並透過總統直選與多次政黨輪替，展現出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實質條件。可是，形式上卻未能徹底解決國家正常化等問題。相較之下，中東歐國家透過制度變革與人民選擇，逐步完成體制轉型與國家重建。在此，凸顯台灣在大戰後特殊的歷史背景與中國因素的長期牽制，使其仍停留在實質與形式不一致的矛盾狀態，這是台灣最值得正視，也最需要思考解決的課題。

李老師提及2019年4月曾在允晨出版社曾發表一本著作《國家之夢，文化之愛：一個詩人的台灣守望2017-2018》著作，作為一位文化創作者與評論家，他很早就積極參與台灣民主運動，這是他能夠理解陳隆志教授，如何看待台灣需要解決的種種歷史問題的主因。談到台灣當前所面對的種種問題，李老師剖析中東歐國家民主選舉活動能夠成功的原因有三：

第一、中東歐國家在共產化之前，原本就存在公民意識、市民意識的文化條件。反觀，台灣雖然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是我們作為國家的主人，尚未具備作為國家主人的意識與高度，這是兩者最大的差別。

第二、教會的保護，所謂教會的保護是指共產黨政府高壓統治時，天主教或基督教教會妥適扮演保護政治異議分子的角色，協助政治異議分子擺脫來自執政者政治追殺的威脅，使得民主運動的香火得以延續。反觀，台灣的政治異議分子在戒嚴時期，雖然得到來自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掩護保護，但是在政治民主化之後，台灣社會的傳統宗教不但沒有扮演政治進步的角色，反而被中國宗教統戰勢力滲透，使得中國紅統勢力長驅直入伸向台灣社會各個角落。

第三、東歐洲文化藝術的存在價值，提供東歐各國人民民主意識深化的底蘊，這與台灣社會也是存在極大的不同。

李老師總結指出，陳隆志教授從法律學的角度切入，對台灣民主發展與獨立運動提出制訂台灣憲法、台灣正名與加入聯合國等國家正常化的方向。不過，李也提醒國人關注台灣內部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使得國家正常化的道路走來危機重重——人民為何能夠接受現今的中國國民黨違背過去反共抗俄的立場？為何過去採取戒嚴統治、壓迫台灣人民的中國國民黨，還是可以吸引這麼多台灣人加入？甚至台灣民主化之後，中國國民黨政權依然能夠贏得選舉屹立不搖？這是台灣文化的病理。顯然，台灣人作為現代意識的

公民，從精神與文化層面上來看是不及格的。

台灣問題的根本，終究還是在台灣人本身，台灣內部長期存在嚴重的政治分歧，使得台灣國家正常化之路走起來危機重重。假使台灣人民具備追求自由民主與獨立自主的堅定意志，那麼無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何打壓，或國際社會如何反對，都無法改變台灣人民想要自己決定未來的決心。我們今日所享有的民主與自由，來自一代又一代民主前輩長年流血流汗的付出與犧牲，這份成果得來不易，需要我們用心守護。一旦有人以民主之名、行顛覆民主之實，甚至利用制度來傷害台灣人民利益，我們不能迴避必須勇敢回應。

我們必須瞭解台灣內部所面對的文化困境，這個核心挑戰至少包含兩個層面：第一是「歷史糾葛」所造成國家發展的困境。長期以來，台灣未能建立以自身為主體的歷史觀，以致於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人把中華民國視為「祖國」的政治認同，沒想到卻捲入國共內戰及其延伸的國際與雙邊對立的結構之中。這種歷史的錯置與牽連，使台灣要走向國家正常化，往往不是在討論如何前進，而是在反覆承受歷史包袱的拉扯，變得更加艱難。

第二是「現實困境」所帶來的文化與公民人格課題。台灣2000年首次完成政黨輪替至今已二十五年，若再加上之前的威權戒嚴統治時期，台灣人在中華民國體制下生活的時間，早已遠超過其曾經統治中國大陸的三十八年。換句話說，台灣若想要成為一個真正成熟的現代國家，需要強化作為一個「近代台灣國民」與「世界公民」所必備文化人格意識；也就是能以台灣為主體，理解國家、社會與公民責任之間的關係，並以此支撐民主運作的韌性。

因此，我們今天舉辦陳隆志教授回憶錄新書發表會的最大意義，不僅是祝賀陳教授九十歲生日而已，而是要彼此共勉：台灣民主政治運動的推進，需要持續深化現代化國家的文化義理與公共價值，讓更多台灣人看見並理解「國家正常化」的具體意義，避免國家發展能量在空轉中消耗殆盡。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在國際舞台上更穩健地發聲、發光，並以民主、人權與法治的實踐，對全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

陳儀深／國史館館長

陳館長表示獲邀在陳隆志教授回憶錄中撰寫一篇序言，是他個人極大的榮幸，部分的原因或許是他現任國史館館長，另一方面可能是2007年他曾到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進行錄音訪問、製作口述訪談紀錄。2012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陳隆志教授與其他著名的人物如黃昭堂、蔡同榮、張燦塗、彭明敏、陳榮成等人，被納入《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的續篇。基本上，《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主要對象是三、四十年代出生，而且在五、六十年代出國，在美國、日本與歐洲的台灣留學生，他們離開威權戒嚴統治的台灣，到國外呼吸自由的空氣，是如何組織或參與台灣人社團、乃至走上台獨之路？他們幾乎都成為海外黑名單、

有家歸不得，只好滯留國外發展事業，直到解除戒嚴、黑名單解禁之後才有部分人回國定居，甚至參與政治擔任公職。

陳隆志教授與其他投身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前輩相比，最大的差異在於他不僅是運動的參與者，更是一位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理論家。2012年6月，陳館長曾在《自由時報》發表〈丘宏達與陳隆志〉一文；文中提及馬英九總統對丘宏達教授推崇備至。然而，若從外交部後來公開的機密檔案檢視，我們發現早在1967年，陳隆志教授與當時社會科學大師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教授合作發表*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Formosa in the World Community*，主張以公民投票自決作為台灣前途的正當程序，並提出「一台一中」的政治定位，此時即造成中國國民黨當局的緊張，於是國民黨內部的「海外對匪鬥爭統一指導委員會」緊急召集外交與情治系統進行會商，並試圖透過威脅、利誘等方式阻止該書出版。當時丘宏達教授建議中國國民黨編撰專書予以反駁，隨後即出版*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Taiwan: Document and Analysis*有關台灣問題文件的英文書，就是與陳教授主張互相對立的明證。

陳隆志教授既是台灣國寶級的思想家，也是將理念落實於行動的實踐者。他不僅長期從事學術研究、著書探討台灣問題，也積極投入海外台灣獨立運動，參與建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FAI）與「世界性台獨聯盟」（WUFI）。尤其1970年世界性台獨聯盟成立之際，其「成立宣言」即出自陳教授之手，充分展現他在論述建構與行動實踐的關鍵角色。

眾所周知，1970年台灣內外重大事件接連發生：1970年1月1日「世界性台獨聯盟」成立，翌日又傳出彭明敏教授成功逃離台灣的消息；同年4月24日，發生黃文雄、鄭自才刺殺蔣經國事件。與此同時，聯合國內部「中國代表權爭議」日益激烈，中華民國的國際處境更顯得風雨飄搖。就在此一關鍵時刻，陳隆志教授代表世界性台獨聯盟，分別向美國尼克森（Richard M. Nixon）總統與各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提出說帖，呼籲國際社會應支持台灣人民自決，並以「一台一中」方案，根本處理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爭議。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就「中國代表權問題」召開會議並進入關鍵表決，多項方案同時被併案納入討論。首先，阿爾巴尼亞代表提出（又稱「排我納匪」案），主張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並將蔣介石政權代表逐出聯合國。其次，另有美國提出「雙重代表權」案——北京政權進入聯合國的同時，仍保留中華民國的席次。雖然聯合國大會最終通過由阿爾巴尼亞所提出的2758號決議，使中華民國的國際處境陷入困境，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早在聯大2758號決議通過之前，陳教授的說帖，深深影響沙烏地阿拉伯駐聯合國巴魯迪（Jamail Baroodi）大使，促使其提出「一台一中」的決議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內的中國代表權，而台灣則以「台灣」名義續留聯合國，同時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台灣的未來。

此外，陳館長特別指出，聯大第2758號決議是為解決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爭議：該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在聯合國內的唯一合法代表，並將蔣介石的代表逐出聯合國；該決議內容完全沒有提到台灣歸屬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以來為了併吞台灣的目的，刻意曲解該決議內容，對外宣稱聯合國已決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即使近期美中領袖會面，北京當局仍一再重申此一說法。我們如何提出一套完整的國際法理論述，反駁中國對聯大2758號決議的刻意扭曲，陳隆志教授在這一方面的理論與思想，顯得格外重要，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事實上，仔細探究聯大2758號決議的內容，可以發現該決議完全無涉台灣歸屬的問題，這背後主要的原因乃是其他會員國，並不贊成聯合國將台灣排除在聯合國之外，所以採取一個籠統的名稱，即所謂「蔣介石（政權）的代表」，且隻字未提台灣。此外，陳館長補充說明1971年台獨聯盟在《台灣青年》月刊顯示——台獨聯盟雖然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體系內代表中國，但是也強調國際社會應該務實看待當前的事實，不應該將當時一千多萬台灣人民排除在聯合國大門之外。

陳隆志教授在他1971年發表的《台灣的獨立與建國》書中第一章，提到「台灣人是無國家、無政府之民」，當時的論述主張台灣並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強調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未定，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人民舉行公民投票來決定。1952年《舊金山對日和約》生效，日本正式放棄對台灣的一切權益之後，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長期被認為「地位未定」，這是陳教授1971年當時主張的基礎。但是，堅持台灣地位未定論並不足以回應《舊金山對日和約》生效後經過四十年國內外情勢的變遷，特別是1987年蔣經國解除戒嚴，結束威權統治，隨後又有李登輝總統領導下，陸續推動六次修憲、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等政治改革，這是台灣的民主轉型、台灣人民自決的過程，使得台灣的國際地位不再是「未定」。自1990年代開始，台灣演變進化成為一個國家，這是1991年陳教授獲邀在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發表「島國台灣地位的進化與退化——舊金山和約四十年後」主題演講的主軸，奠定「台灣國家進化論」的基礎。

陳儀深館長指出，陳隆志教授強調台灣雖然已經逐步進化為一個國家，但至今還不是一個真正正常化的國家。因此，又提出「台灣國家正常化」的主張，強調台灣人民必須同心協力、持續打拚，共同推動，包括：台灣正名、制定台灣憲法、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成為會員國、落實轉型正義，以及培養正常化國家國民應有的意志、氣度與自信心等幾項重要的大工程。

他認為陳隆志教授這一套完整而有系統的論述，對台灣非常重要。它幫助台灣人更清楚理解台灣目前所面對的問題，不只是一定要不要獨立而已，也包括如何處理「中華民國」這個歷史軀殼所帶來的國家定位困境。事實上，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之前，台灣仍處於威權統治的階段；但自從總統直選開始之後，台灣歷經每四年一次的民主選舉，以及此後三十年間三次的政黨輪替，台灣人民透過一次又一次公開、公正的投票程序，具

體展現出自主決定自身前途的政治意志。因此，「有效自決」與「演進獨立」的主張，便成為我們理解台灣國家地位問題時，極具說服力的重要論述。

陳館長再強調處理台灣問題時，絕對不能見樹不見林。除了關注眼前的個別議題與細節之外，更要掌握整體的歷史脈絡與全局方向，這樣才能作出正確判斷。他肯定陳隆志教授一再重申的國際法「政策科學派」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原則：第一是「動態」，第二是「全面關照」。所謂「動態」，就是歷史與國際法秩序並不是靜止不動的，而是持續演進的；所謂「全面關照」，則是不能只抓住某一段歷史或某一份文件，就斷定台灣的地位。如果我們只是片面著眼於「開羅宣言」或「波茨坦宣言」的內容，卻忽略《舊金山對日和約》在國際法上的重要地位與後續效力，就很容易掉入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共同建構的「台灣是中國一部分」這套論述陷阱。一旦落入這樣的框架，台灣不但無法釐清自身的國際法地位，反而會繼續被困在國共內戰的歷史泥沼之中。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重新閱讀陳教授的主張，重新理解台灣國家正常化的意義，不只是歷史的回顧，更是面向未來、思考台灣應該走向何方的重要起點。

最後，陳館長也請大家持續關注國史館近年推動的史料彙編工作，以及「關鍵1991：李登輝與臺灣民主元年」與「戰後台美關係回顧」等重要展覽。其中，1991年李登輝總統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隨後又推動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全面改選，正式揭開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政治改革的新頁。至於「戰後台美關係回顧」展，外交部林佳龍部長與美國在台協會（AIT）谷立言處長都曾來參觀，對展覽內容深表肯定。該展覽內容從1950年國民政府遷台談起，隨後韓戰爆發、《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署、美援啟動，到1971年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1979年台美斷交與《台灣關係法》制定，接著雷根總統又提出「六項保證」等重要歷史轉折，呈現戰後台美關係的演變脈絡。這些關鍵歷史階段，不僅深刻影響台灣的國際處境與發展方向，也牽動台灣由威權體制走向民主開放的歷程，值得社會各界進一步深思。

蔡滄波／鏡電視總經理

蔡總經理首先談到第一次採訪陳隆志教授的過程，因為他年輕時投身黨外運動，曾擔任過康寧祥委員的助理，結識不少民主運動前輩。從許多前輩的口中，他得知有一位極為傑出的台灣人，在學中參加各項國家考試名列前茅，其後赴美留學，又加入台獨聯盟，投入台灣獨立與建國運動，大家以「狀元造反」來肯定他的表現。當時一般人的觀念中，總是認為擁有「三榜狀元」殊榮的人才，拿到博士學位回台之後，不是在政府當官享受榮華富貴，或是在學校擔任教授前途似錦一片光明，但是陳教授的選擇卻跌破大家的眼鏡。

蔡總經理在演講中進一步回顧自身赴美求學與新聞工作的經歷。他表示，自己在美國完成學業後進入《自立晚報》服務，擔任美國華府的特派員。由於本身具有黨外背

景，赴美求學期間也自然與FAPA、台灣同鄉會等海外台灣人團體有所往來。蔡總經理指出，自「四二四刺蔣案」發生後，陳隆志教授便一度淡出台灣人聚會的公開場合。直到1991年7月，方菊雄教授主辦美東台灣人夏令營，這場活動是當時全美台灣人最具規模的重要集會，不僅許多從事台灣獨立運動的人士會出席，甚至不少台灣本地人士也專程赴美參加難得的大型聚會，大家針對台灣前途及相關重要議題深入討論、交換意見。

當時聽到陳隆志教授受邀出席夏令營，並將發表主題為〈島國台灣地位的進化與退化——舊金山和約四十年後〉的專題演講，為此他特別前往現場聆聽。陳教授當天的演講論述完整，內容極為豐富，在演講結束後，他隨即透過傳真方式，將演講全文傳回台灣，並安排自1991年7月23日起，連續三天刊登於《自立晚報》副刊。蔡總經理強調，在台灣尚未解除戒嚴之前，《自立晚報》是台灣社會相當重要的媒體，當時《自立晚報》展現突破言論限制的媒體精神，勇敢挑戰中國國民黨的政治禁忌，全文刊載陳隆志教授這篇涉及台灣地位與前途的重要文章，相當不容易。

自首次採訪並報導陳隆志教授的演講內容後，蔡總經理與陳教授建立良好互動，往後亦多次前往耶魯法學院向陳教授請益有關台灣憲法文化的問題，1993年海外黑名單解禁，陳隆志教授鮭魚返鄉回台之前，《自立晚報》刊登數篇專訪報導，向台灣社會較為完整介紹陳隆志教授的學術成就與貢獻。

蔡總經理表示，過去在民視服務期間，他時常聽聞老長官、時任民視董事長的蔡同榮博士提起陳教授。蔡董事長與陳教授同為台大法律系同學，他對陳教授的學識與人品、為台灣奉獻的熱忱，始終給予高度肯定。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民視開設一個《民視評論》的節目，邀請李鴻禧、陳隆志、陳博志教授及司馬文武等傑出學者專家上電視，以台語分別就憲法、國際法、經濟、新聞等不同專業領域進行評論與開講，廣受社會各界好評。蔡總經理認為，能夠參與製作這樣深具公共意義的節目，是他個人的一項榮耀，也讓他從中獲得許多寶貴知識，受益良多。

蔡總經理接著表示，他之所以由衷敬佩陳教授，原因有二：第一、是陳教授的深厚學養與高尚人品；第二、則是陳教授與恩師、世界級學術大師Harold D. Lasswell教授合作，於1967年發表英文著作*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向國際社會提出「一台一中」與台灣人民自決的主張，充分傳達台灣人民的心聲。蔡總經理指出，陳教授是第一位躋身國際法學主流的台灣學者。他與政策科學學派宗師Lasswell教授攜手合作，運用政策科學方法詮釋國際法，進一步闡明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使台灣議題的探討不再僅限於台灣內部，而擴大走向國際化。

蔡總經理最後強調，他由衷感謝陳隆志教授長年來為台灣所作的犧牲與奉獻。在他看來，陳教授不但提出「台灣國家進化論」的法理論述，清楚闡明台灣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同時也把台灣國家的正常化工作，作為下一個階段要全力以赴的目標。◆